

在第一屆亞太地區都市建設會議揭幕典禮致詞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主席、各位與會貴賓、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本人得有機會參加「第一屆亞太地區都市建設會議」，實感十分愉快，在座的諸位先生，都是來自亞太地區不同國家的都市發展專家，學術上有精湛的成就，事業上有豐富的經驗，素為我國人所欽佩，此次遠道蒞臨，乃是中華民國的榮幸，本人願在此先向各位先生致敬歡迎之意。

坦誠地說，本人並非都市規劃專家，因此覺得來向大會致詞，恐難有所貢獻，不過在我多年來服務公職的生涯中，經常處理重大設計畫的決策工作，對於都市問題之重要性的體認也較為深切，所以很願意將我個人對這個問題的一些所見，提供給諸位先生參考。

過去二十餘年來，全世界最普遍的現象之一，即為經濟發展以及隨之而來的都市迅速成長，這種現象在亞太地區各個國家更為顯著。這裡，我想就中華民國臺灣地區的情形簡單說明如下：我國自民國四十二年實施第一期四年經濟建設設計畫以來，經濟成長相當卓著，國內生產毛額和平均每人所得都高速增加，根據民國四十一年至六十六年的資料，在此期間國內生產毛額增加七·一倍，平均每人所得增加三·三倍，平均每年成長率分別維持在百分之八·二和百分之四·九。隨同經濟成長，經濟結構已產生顯著改變，農業部門生產佔國內生產毛額的比重由百分之三五·七降為百分之二三·四；而工業部門生產之比重則從百分之二七·九增至百分之三八·七。

緊隨著經濟發展，都市成長亦非常迅速。民國四十一年臺灣地區的都市人口，佔總人口的比例為百分之四七·六，人口五萬以上的都市地區共僅十二處，臺北都會區初見端倪。至民國六十六年，都市人口增為總人口的百分之

六六·九，人口五萬以上的都市亦增為六十六處，都會區的形成已遍及主要都市及其附廓。民國四十一年至六十六年間，都市人口平均每年增加百分之四·四，而同一期間，總人口平均每年增加僅為百分之二·九，而若干地區，尤其為都會區，人口增加率更高達每年百分之五·〇。

過去二十餘年來都市人口快速成長的因素有二：即都市地區本身的自然增加和從農村地區移入的社會增加。都市人口的自然增加率和總人口的自然增加率非常接近，從民國四十一年到六十六年，從百分之三·六七降至六十六年的百分之一·九〇，自然增加以外的人口全為社會增加。民國六十六年臺灣地區三〇〇個鄉鎮中，約有二五一個鄉鎮的人口有淨移出，移出人口數達十三萬五千人，至於有淨移入人口的市鎮均為規模較大的城市。

臺灣地區的都市發展與規劃，從民前十五年第一個都市計畫在臺北市實施以來，約有八十年的歷史，早期的階段，從民前十五年至民國四十九年，係以個別的市鎮為規劃發展單位，其重點在於市鎮實質設施的分布，藉以管制私人的發展活動，而公共部門的實質發展的管制則較寬。

民國四十年代後期，由於都會區的形成，帶來了新的都市生活方式，需要更為迫切而且複雜的公共設施，為了使新增的都市人口獲得合理的分配，需要新市鎮的開發，舊市區的擴大，和提供適當的各種公共設施，自民國四十九年以後，遂有若干區域計畫的擬定，計畫內容涉及人口和經濟活動的分布，土地使用模式、天然資源的開發和保育，以及交通運輸系統的建立。

民國五十年代後期，臺灣地區的經濟發展，引起整個經濟、社會結構和實質發展模式的顯著改變，其對人民的影響可說是正負互見：在正的方面而言，有國民生產毛額和平均每人所得的增加、人民生活水準的提高、受教育者所佔比例的增加等；在負的方面而言，則為生活環境的惡化、交通擁擠、住宅不敷、水和空氣的污染、人口過度集中於少數幾個都市、區域間平均每人所得和人口成長差距的加大等等。為了使上述經濟發展在未來二十年內產生最大正面效果並儘量縮小反面效果，我國自民國六十年起擬臺灣地區綜合開發計畫，制定臺灣地區整體發展綱要，

以均衡發展為綜合開發的基本政策，而都市發展則成為國家綜合開發的一環。此外，都市發展並受技術革新、社會組織、人類價值觀念的影響，因此，綜合開發計畫對此均加以整體的考慮。以上所述，均與此次會議之主題密切相關。

亞太地區都市建設會議的召開，使我們亞太地區自由世界內的都市規劃人員和決策人員歡聚一堂，互相切磋討論，希望將因這次的會議，使參與人員能保持廣泛的接觸，交換心得與經驗，群策群力，接受都市化問題的挑戰。本人深信，由於各位先的努力和發揚光大，而造福亞太地區自由國家內的人群。

最後，本人願以最誠摯的祝福，預祝大會的成功，諸位先生身心健康愉快，謝謝各位。